

蒋介石于1927年4月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后，曾三次下野。第一次是1927年8月13日至1928年1月4日，第二次是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8日，第三次是1949年1月21日至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每次下野，都要回家乡奉化溪口作或长或短的停留，第三次下野停留时间最长，共3月余。以后许多人曾撰文记录他在家乡的行踪，或不大详细，或不甚准确。最近笔者看到当时主管蒋介石警卫和侍卫工作的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的回忆文章，有不少新的发现，特撰此文，以供研究者参考。

俞济时和蒋介石的关系

许多人撰文说，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外甥，此说子虚乌有。蒋介石是溪口人，俞济时是奉化县城人，蒋、俞两家从无婚嫁之事，怎有舅甥关系？那么，他们是什么关系呢？是同乡、师生、部属关系。蒋介石于1887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出生于溪口，俞济时于1904年农历五月一日出生于县城南门俞家阊门，二人籍贯都是浙江奉化。1924年6月14日，国民党在广州主办的陆军军

官学校开学，蒋介石任校长，俞济时为黄埔一期学生，二人有师生之谊。以后，俞济时在蒋介石麾下，参加东征北伐，任职警卫部队，1942年调任蒋介石的侍卫长，直到1956年才解除主持警卫任务，时间长达15年。在1942年至1956年期间，蒋介石走到哪里，俞济时跟到哪里，所以最了解蒋介石这一时期行踪的莫过于俞济时，他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是值得注意的。

下野前的准备

蒋介石考虑下野，开始于济南战役结束。

1948年9月，济南被围。蒋介石于9月16日飞临济南，原拟只停留两天，到达后临时改变计划，延为7天。在此期间，蒋介石不断巡视各级指挥所、重要据点阵地，分批召集军官讲话，邀请地方官长和士绅座谈。最后几天，解放军炮火已威胁济南辛庄机场，俞济时每天劝蒋介石早日回京，并电请宋美龄来电促回。宋美龄来电云：“最高统帅，身系国家安危，为盱衡全局，希望不要久留。”至此，蒋介石才于21日飞离济南。3天之后的9月24日，济南解放。这次济南之行，使蒋介石亲身体会到解放军的攻城实

力，感到军事上的败局已经很难挽回，自身地位岌岌可危，因而开始作下野打算。

回到南京，蒋介石即调卫士一队，赴溪口协助地方治安；11月，又增调卫士一队赴溪口，并传谕浙江省保安处，严令限期“肃清”四明山中共领导下的武装。不久，宋美龄启程赴美，行前当面嘱咐俞济时：“将来离京时，官邸家具，照旧放置不可搬动。”可见宋美龄当时已预见到南京已非久留之地。

接着，蒋介石于1949年1月12日命蒋经国率领俞济时和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部署警卫通讯网，架设电台，预作退居幕后指挥准备。现在，几乎所有涉及蒋介石幕后指挥的文章，都说蒋介石在溪口安了七部电台，但据奉化电讯局档案资料，只有两部，一部在镇上，一部在雪窦山的妙高台别墅。奉化解放后，政府仔细查找，也未找到第三部，“七部”之谈，纯属以讹传讹。

下野到溪口

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引退”，决定比较匆促。俞济时于当日上午8点钟才得到通知。他当即紧急处理三件事：一是派副侍卫

●王舜祁

蒋 介 石

第三次下野内情

长柳元麟留京处理侍卫室事务；二是命军务局留置人员押送重要档案先到上海再转广州待命；三是令警卫大队除以第六队续任总统府警卫勤务外（四、五两队已先期到溪口），大队部及其他各队（即一、二、三队）克日乘火车赴杭州换乘汽车赶往溪口。

1月21日上午10时，蒋介石赴南京中山门外的凯歌堂（即美龄宫）默祷，中午邀请中央五院院长聚餐，下午2时约请国民党中常委座谈，宣告“引退”，并出示与副总统李宗仁联合宣言，下午4时在明故宫机场起飞，绕南京一周，即飞杭州，近6时到达笕桥空军学校。当晚，蒋介石宿于天健北楼，侍从人员则临时安顿在大礼堂住宿。22日上午10时半，离杭州抵宁波栎社机场，乘车回到家乡奉化溪口。

蒋介石到溪口的当天，住宿于其母墓庐“慈庵”。为适应情况变化，俞济时经蒋同意，对随从人员进行重新编组。共编三组，第一组负责军事、电信，组长为高参杨学房，下辖军事、电信两股，分别以高参于豪章、总统府机要室副主任张廷楨为股长；第二组负责警卫，以侍卫长石祖德为组长，下辖侍卫股、警务股、特警组、特务大队（下辖6个中队），侍卫股、警务股分别以副侍卫长俞滨东、钟民祉为股长，特警组组长张尧亮，特务大队大队长史朴如上校；第三组负责经济、生活，由侍从武官夏功权任组长，下辖总务股、经理股，分别以副官陆仲武、后勤部专员高梦南为股长。官邸内务科及随从医官、摄影等直接听命于俞济时。

蒋介石落脚溪口，溪口即取代南京，成为国民党政治中心，军政要员纷至沓来。仅据蒋经国的日记不完全记载，就有：

一月二十八日，“全家在报本堂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在座的有张群、陈立夫、郑彦棻等。”

一月二十九日，“接见黄少谷，决将中央党部先行迁粤，就现况加以整顿，再图根本改革。”

一月三十一日，“国防部次长林蔚文先生自南京来溪口。”

二月七日，“李弥将军来寓，父亲约彼聚餐。李报告陈官庄突围经过及其沿途情形”。

二月七日，“阎百川（锡山）到溪口，张道藩、谷正纲同时到达。”

三月三日，“张治中访溪口。”

三月十九日，“汤恩伯到溪口，约见万耀煌商讨中央训练机构的地点和办法。”

三月二十四日，“陈诚自台湾到溪口。”

四月十日，“周至柔总司令、胡宗南长官到奉化。”

四月十二日，“居觉生（正），陈启天访溪口”。

蒋介石在溪口的幕后指挥，仅举数例，以见一斑。

1949年1月底，蒋介石召军政部长何应钦、总参谋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到溪口，部署长江防务。按照蒋介石的旨意，确定调集115个师和海军军舰26艘，炮艇26艘，空军飞机280架，担任宜昌至上海1800多公里的长江防务。以湖口为界划分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指挥，约40个师的兵力；湖口以东归汤恩伯指挥，约75个师的兵力。汤恩伯秉承蒋介石“确保沪杭”的指示，将重兵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于南京上下游，则只留少数部队以为应付。许多人反对这个布阵方案，但汤恩伯执行的是“最高指示”，任何人都

没有办法加以改变。据李宗仁回忆，1949年2月16日，李在总统府宴请留京高级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一席未终，蒋介石三次直接从奉化溪口打电话给顾祝同，过问军事情况。顾调动一兵一卒均听命于蒋。

1949年3月8日，孙科内阁总辞职，蒋介石估计李宗仁可能拉居正重组新阁。居是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1916年6月蒋介石去山东潍县就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居正是该军司令。蒋不喜欢老上司当行政院长，就打电话请当时住在上海的阎锡山来溪口密商阻止居正组阁问题。经过多方考虑，两人想出一条“妙计”，命陈立夫以头颅担保，在投票箱上做手脚，保证不让居正组阁。结果居正果未入选，何应钦于3月24日继孙科出任行政院长。此事阎锡山当时对随行秘书守口如瓶，只字未吐，直至到了台湾，在一次晚饭后洗脚时才把详情透露给其秘书傅朝枢。

蒋介石“引退”溪口以后，表面上赞同“和谈”，实际上布置战争。1949年1月26日，从奉化溪口致函国民党军事、政治、党务、特务首领，命令他们必须作战到底。29日，参谋总长顾祝同秉承蒋的旨意，向国民党部队发布了誓与人民解放军作战到底的密令。2月2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党部、各党报发布“特别宣传指示”，进行战争准备。4月20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和平谈判宣告破裂。22日，蒋介石由溪口赶到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群、汤恩伯等商讨“最后一战的全面作战计划”。这时，蒋介石已经开始从幕后站到幕前来了。

从溪口到上海

4月23日,蒋介石从杭州返回溪口。当晚,俞济时即召集蒋介石随从各主管商定撤离溪口计划。最后决定:第一,确定随蒋行动的必要人员,名单如下:随从秘书周宏涛、曹圣芬,军事股长于豪章,电讯股长张廷楨,译电丁勤夫,陈衡,通信邱桐阶,侍从武官兼组长夏功权,副官王新标,事务员赵志华,侍卫长兼警卫组长石祖德,侍卫股长俞滨东,侍卫官周国成、季竣官、杨凤藻、吕德彰、俞锡昌、夏定峰、徐锡鸿、张京云、蒋治平、张治邦、王玄飞、甘霖皋、曹崧,警务股长钟民祉,警务员赵品玉、潘汉民、吴亲仁、李凤超、刘永坚,侍卫张茂才、张顺铨、蒋孝杰、何占斌、郑衍绅、严飞雄、张松年、蔡张才、余永寿、王焕彬、胡克鲁、裘伯芳、朱清来、楼绍棠、贺岳华、俞忠元、郭成孝,侍从医官熊九,摄影胡崇贤,官邸内务科代科长蒋孝镇等。第二,其他官兵及眷属与行李均搭乘登陆舰在宁波上船,派高参杨学房为登陆舰指挥,特务大队大队长史朴如

为副指挥,眷属由各单位指定负责人员严加掌握。第三、俞济时判断蒋介石可能在象山港登“太康号”座舰出海,派特务大队副队长徐耀庭率领一个加强区队登舰卫护。24日中午,蒋介石下令:“把船只准备好,明天离开溪口。”宣布了从象山港登“太康号”军舰出走。

4月25日,是蒋介石离开溪口的最后日子。上午,由经国陪侍先至其母亲王采玉墓前辞行,下午再到蒋氏宗祠祭祖,随后向各近亲族人告别,然后乘车离开溪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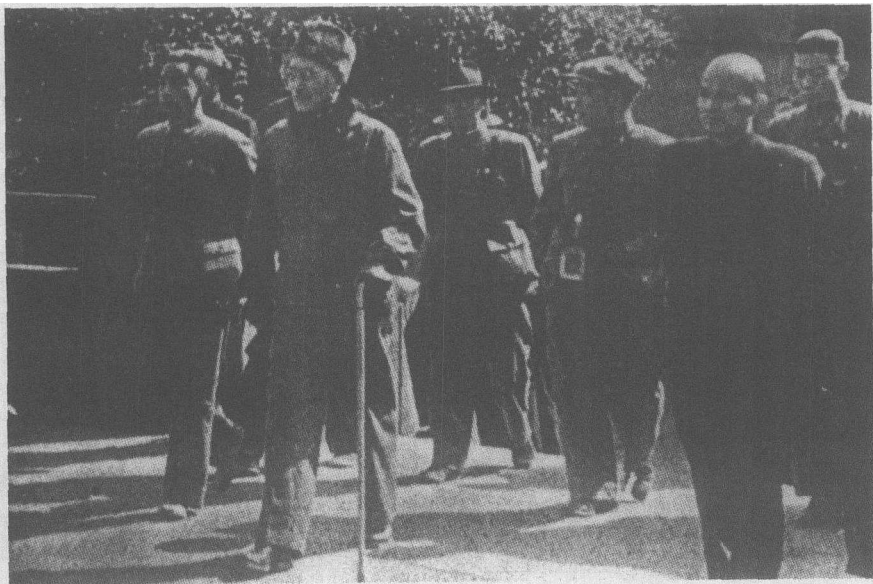
“太康号”座舰停在宁海县西店乡团埂村。该村位于宁海东北角,和奉化的鹤埭村相邻,南濒象山港。埂是小土山的意思,其地东西西北三面环山,因以得名,离溪口40余公里。由于“太康号”座舰吃水较深,所以,蒋介石一行先从岸边乘竹筏登汽艇,再由汽艇驶到军舰上。蒋介石登上竹筏,即翻地图,不时查问地名。他指着东北方向的栖凤村问:“这是长河头吗?”撑排人回答:“不是长河头,是栖凤村。”又问:“是桐照栖凤的那个栖凤吗?”回答:“是的。”蒋介石又指着一个地方问:“这是什么地方?”撑排的

人回答:“这是加爵科,土名喜鹊窝。”蒋介石感到这个地名很吉利,高兴地点点头。蒋介石下竹筏上汽艇后,又从舱里伸出头来关照卫士:“扶俞先生一把!”这时撑排人才发现俞济时患有足疾,走路略有不便。登上军舰,蒋经国问:“去向哪里?”蒋介石说“直驶上海”。

4月26日晨,“太康号”驶进吴淞口,中午在复兴岛登岸。后因复兴岛距上海市区较远,驻市军政人员往来请示多有不便,乃于27日进驻市区全神父路的励志社。蒋介石在上海市区住了10天,分批召集地方人士,商讨守卫上海有关事宜,又召集黄埔军校各期学生训话,要他们守住上海。据俞济时说:此期间,蒋“每日由早到晚辛劳备至,洵无一刻时间休息”。5月7日晨,蒋介石登上江静轮,由复兴岛启程,驶离上海。进入舟山,不断巡弋大小诸岛屿,偶而登岸访察或游览名胜古迹,在海上漂泊20天,于5月26日自定海机场飞抵台湾冈山机场,乘车至高雄,下榻寿山。

穿梭于台湾大陆之间

早在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之后,蒋介石就开始作迁往台湾的准备。据俞济时回忆:“本年(1948)9月24日济南沦陷,战局有急转直下之势,余为未雨绸缪,乃预嘱军务局高参杨学房、尹国祥两位将军即清理档案,先区分保留及不需保留两类,然后再将需保留部分区分(一)必要时先送台湾,(二)随总统府办公必须随带查参文件,(三)随总统行动期间必须随带查参文件三类。另机要室档案区分为必要时先送台湾及随从总统办公必须随身携带两类,并各分别装箱应变。把档案送往台湾,这当然不



1949年4月8日,蒋介石下野回乡游金峨寺

是俞济时个人的擅自决定,而是蒋介石采取的一个重大决策。10月,长春、锦州解放;11月,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蒋介石的精锐部队黄百韬兵团覆没,形势对蒋更为不利,乃开始转移档案的行动。总统府机要室副主任张廷桢将第一批重要手令档案及密件等,派科员汪守芝搭空军专机押送台湾,送大溪档案室保管。12月,军务局第一批重要档案,由杨学房搭空军专机运台。1949年1月上旬,军务局又一批档案和机要室第二批档案,由海军舰艇运送台湾。

接着,部署了迁台的人事安排。1949年1月1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1月12日,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派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任命宋子文为广东省主席,派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彭孟緝为副总司令。离京飞杭的那天,又公布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当时尚在国民党控制下的东南、西南半壁江山,尽为其亲信所掌握,形成了一个拱卫台湾的态势。

而后再把钱钞运往台湾。1949年1月10日,派蒋经国到上海,将国库所存银元、黄金、美钞全部运往台湾,其中黄金390万盎司,美元7000万,白银价值7000万美

元,按海外比值,总计约为5亿美元。1月21日,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有美金1000万元,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及手头购料余款全部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以备日后不虞之需。李宗仁上台后,由于国库空虚,财政困难,曾命行政院财政部将运台资金运回一部分备用,后又两次派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赴台湾交涉此事,均遭陈诚顶回。

蒋介石于1949年5月26日自舟山赴台,到1949年12月10日最后从成都离开大陆到台湾,6个半月时间,除7月、8月出访菲律宾、南朝鲜外,6次穿梭往返于台湾大陆之间,作踞守东南、西南的最后挣扎。7月14日上午8时,蒋介石由台南飞广州。16日上午出席国民党中常会,下午出席非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1日上午8时半,由黄埔乘华联轮出海,22日正午抵厦门鼓浪屿登陆,随即召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与汤恩伯。23日召集闽南各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开会,指示作战事宜。26日上午10时,由厦门飞返台北。此行共12天。

8月9日上午10时,蒋介石从台湾到福州,在福州空军补给站召见朱绍良,下午4时召见陆军团长、海军舰长以上军官,下午6时飞回台北,当日来回。

8月23日,蒋介石从台湾到广州,驻东山别墅。24日中午12时半,由广州飞重庆,驻林园官邸。9月12日上午10时半,由重庆飞成都,驻陆军官校。17日正午,由成都飞回重庆,驻黄山官邸。22日由重庆飞昆明,上午10时到达,下午4时离昆明飞广州。10月3日上午7时半,由广州飞台北,上午10时到达。此行来回40天。

10月6日上午10时,蒋介石从基隆登华联轮,下午3时启碇驶向厦门,7日上午10时到达,下午4时登岸,在汤恩伯总部对团长以上军官训话,接着接见地方绅耆,晚8时回华联轮。8日上午9时,乘华联轮抵马公,10时在马公机场登机飞台北市,11时抵松山机场。

10月12日下午3时,蒋介石飞往定海,14日飞回台北。

11月14日上午11时,蒋介石在台北登机,下午4时到达重庆。11月29日晚23时许,至白市驿机场,登中美号专机休息,次日晨5时起飞,中途在新津机场降落,入励志社休息,并进早餐,续飞成都凤凰山机场,到达后即入住陆军军官学校。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通电起义,紧接着云南卢汉起义,电刘文辉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在此危急情况下,蒋介石于10日下午2时许乘车赴凤凰山机场,登机返台,18时到达台北,从此永远离开大陆。俞济时回忆当时的危险程度说:“此次蒋公成都之行,身入虎穴,其危险程度较西安事变有过之而无不及……”

1950年2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在蒋介石“同意”之下,宣布蒋将于3月1日复职视事。3月1日,蒋介石正式复“总统”职。至此,他的第三次下野宣告结束。



1946年7月7日,蒋介石夫妇回奉化溪口扫墓与侍从人员合影